

中央编译出版社



流亡的先知

TROTSKY 1929-1940
托洛茨基

先知三部曲

【波】伊萨克·多伊彻 / 著





密亡的先知

（一）

先知三部曲

（二）



KJ35.127.5

7953D

先知三部曲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

[波]伊萨克·多伊彻 著

施用勤

张冰 译

刘虎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北京

037565

前 言

在我著的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叙述了托洛茨基人生悲剧的悲惨结局。在悲剧的结局中,主角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但是,托洛茨基始终与斯大林进行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他是后者唯一公开的敌人。在1929—1940年这12年中,在苏联听不到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抗议,除了许多斯大林的反对者被迫屈辱地承认自己有罪之外,甚至连昔日紧张激烈的斗争的余音也已经沉寂。于是,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中只能孤军作战。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巨大的历史冲突似乎集中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中。传记作者应该指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并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关系的巧合,

正是这些情况和相互关系使斯大林成为“冒牌英雄”，使托洛茨基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唯一代言人。

因此，除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之外，我还应该叙述这一时期震撼人心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苏联狂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大清洗、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在纳粹主义的猛攻下溃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有这些事件都影响到托洛茨基的命运，他在所有这些事件上的立场都与斯大林针锋相对。我不得不回顾当时的主要争论，因为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意识形态的辩论所起的作用与莎士比亚悲剧中战斗的场面同样重要：在通往悲惨结局的途中，这些场面展现出主角的性格。

在本卷中，有关托洛茨基的私生活，特别是托洛茨基一家命运的叙述比重比前两卷要大。读者应不时地把注意力从政治叙述转到通常所谓的“个人故事”（似乎社会事件不是由所有我们的私事构成的，好像政治本身不是个人的杰出活动似的）。在这一阶段中，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与其政治命运是不可分离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他的家庭生活使人们认识这一悲剧，使它变得更为深刻。这一不同寻常、感人至深的故事由本书首次披露，它以托洛茨基与其妻子及子女的私人书信为依据。由于已作古的娜塔利娅·谢多娃的好意，我能自由阅读、使用这些信件。娜塔利娅·谢多娃在其逝世前两年曾请求哈佛大学图书馆对我开放其夫档案的保密部分，即据托洛茨基遗嘱应保密到1980年的那部分档案。

※ ※ ※ ※ ※

我想扼要介绍一下我撰写这部传记时的政治背景。我于1949年底着手这项工作时，正值莫斯科官方庆祝斯大林70寿辰，庆典上人们对斯大林的奴颜婢膝，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

托洛茨基的姓名似乎已被重重的诬蔑和遗忘永远埋葬了。1956年底,我已经出版了《武装的先知》,在准备修改《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的初稿时,苏共二十大的后果、波兰的十月动荡和匈牙利的斗争迫使我中断了这一工作,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事件上去。在布达佩斯,狂怒的人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但在莫斯科,褻渎这一偶像的事仍是秘密地进行,统治集团把它当做不可外扬的家丑。赫鲁晓夫警告二十大上的听众:“我们不能让此事传到党外,绝对不能让它传到新闻界。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洗我们的脏内衣。”我那时评论道:“很难长久地背着苏联人民洗脏内衣。现在就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无论如何,这件‘脏内衣’是用他们的血汗浸泡出来的。洗脏内衣将需要很长时间,能把它彻底洗干净的,大概是更年轻、更干净的人的手,而不是那些开始做此事的人的手。”

《流亡的先知》问世时,某些“洗脏内衣”的行动早已公开,斯大林的遗体也已被迁出红场陵墓。一位敏感的西方漫画家对后一事件的反应是想到,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里搬出来,可能是要把托洛茨基的遗体放到刚刚腾出来的紧挨着列宁的墓穴里。这位漫画家所表达的想法可能有不少苏联人也想到了(虽然人们希望给托洛茨基平反将以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的方式进行)。但是,赫鲁晓夫及其朋友仍竭尽全力保持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的诅咒。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他们都指责对方为托派分子,好像他们两人全力提供的至少是托洛茨基及其思想提出的那些有生命力的问题的消极结果似的。

所有这些事使我更加坚信我的研究题目的现实意义和历史重要性。但是,我对我的某些批评家表示歉意,他们未能有效地影响我撰写这套书的方法及构思。诚然,这部传记在规模上超过了我最初的设想,我原计划只写一卷或两卷,结果却写了三卷。不过,

在这么做时我只是服从——最初是勉强服从——这项工作的写作逻辑和我这项研究本身的逻辑，它们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手中的传记材料为其成形及各自的比例而斗争，并向我提出了它们的要求（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辩解，我都不能在我的一位批评者的眼中开脱自己，他是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说，他“一直认为俄国革命从未发生过”，他想知道我怎么能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就我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态度来说，它始终如一，没有改变。1952年，三部曲的第一卷脱稿，它的最后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在这一章中，我描绘了处于权力巅峰时的托洛茨基。在该卷的前言中我写道，为了更完整地叙述他的生平，我要考虑“一个问题，他的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我在《流亡的先知》的最后几页，即题为《失败中的胜利》的跋中，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资料来源及致谢

本卷的叙述比前两卷更多地依据托洛茨基档案，特别是他与其家庭成员的通信。当我在注释中只写“托洛茨基档案”时，我指的是它的开放部分，它们存放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中，大学生都可以借阅。当我利用档案的“封闭”部分时，我加上“保密部分”这几个字。托洛茨基档案的公开部分的总目录附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参考书目索引中，保密部分的目录附在本卷的参考书目索引中。

在保密部分的两万多份文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与其追随者、朋友之间的政治通信，他要求把这部分封存是由于，他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哈佛大学时（1940年夏），整个欧洲几乎都被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占领，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前途难卜，因此，他

觉得他必须保护与他通信的人。但在这些信函的政治内容中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严格来说是机密或隐私的东西。其中许多我在30年代就已看到过(我马上就会解释通过什么途径),因此,在1959年重读它们时,我发现其中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感到惊讶。另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家人之间的通信,甚至有关家务的通信也放在保密部分之中,这些信件为我揭示了他的纯个人的经历和感情,大大地丰富了他在我心目中的人格形象。

前两卷的某些评论家抱怨我对档案的注释不够详细。我只能指出,我所引用的任何一份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文件均在正文或脚注中注明它出自谁的手笔、写于何时、寄给何人。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已经足够了。过于详尽的注解固然可以大大增强我这部著作的“旁征博引”,但对那些接触不到托洛茨基档案的一般读者及那些很难得到我提到的任何一份文件的学者来说,则没有丝毫用处。此外,在我撰写了前两卷之后,托洛茨基档案已被重新整理,因而,即便我作了更为详尽的注释,现在也都毫无价值(例如,某份文件原在B部分17号文件夹中,但现在A、B、C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文件完全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我一般都标出了所引文件的日期,在霍顿图书馆提供的编印极好的两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索引》中,学者据此能迅速找到该文件。

个别批评家想知道托洛茨基档案的可信程度有多大,托洛茨基或其追随者是否“篡改过文件”。我认为,内在证据和其他信息来源相互映证,都证明托洛茨基档案是可信的,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能从这个档案中找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它的可信性。托洛茨基不屑于干伪造或销毁文件的事。他的追随者们或是没有兴趣,或是忙于其他事情,未必会去窥视其导师的档案。1950年我夫人和我开始接触托洛茨基档案,我们是最早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

有关本世纪30年代的思想状况和对卷入当时党内斗争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描述,我特别着重利用我作为反对斯大林派的波兰共产主义代言人的亲身经历。我参加的那个团体后来与托洛茨基联系密切。他的国际书记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其中部分是机密的,还有供传阅的托洛茨基书信的拷贝,等等。作为一个作家和争论参与者,我深深地卷入了本卷所描述的所有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大量的政治文献,其中有斯大林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派的,布兰德勒派的,还有各国出版的其他小册子、书籍、期刊和传单。当然,在撰写此书时我能利用的只是这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我验证我的印象与记忆的准确程度、核实日期及引文来说,它们足够了。我的参考书目和脚注并没有穷尽该题材所有文献的奢望。

我十分幸运,能从下述诸位那里得到信息以补充从托洛茨基档案(其他印刷资料)中得到的材料,他们是托洛茨基的遗孀、托洛茨基流亡岁月中最亲密的朋友罗斯默夫妇和让娜·马尔金·德·帕莱尔,后者把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的文件和通信交给我;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时期的秘书皮埃尔·弗兰克;科约坎普的秘书兼贴身警卫约瑟夫·汉森,他是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天和最后时刻的见证人;还有许多在某一阶段追随过托洛茨基的其他人(在上述这些人中,娜塔利娅·谢多娃、玛格丽特·罗斯默和让娜·马尔金在本卷脱稿之前就已不幸去世)。

在托洛茨基的家庭和追随者圈子之外的人中,我要感谢康拉德·克努德森和他的夫人,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时曾住在他们家中;还的赫尔杰·克罗格先生和戴尔夫妇,感谢他们提供这么多有关托洛茨基被拘留和驱逐出挪威的事件的信息和生动回忆。我采访了特利格威·赖伊,当年的司法大臣,允许托洛茨基入境以及将他拘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赖伊先生与我进行了详细的长谈,而且不乏

自我曝光，事后他请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一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衰退，二是他与一位美国出版商签定了协议，协议规定他只能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披露有关信息。赖伊先生好意地将他于1937年提交挪威议会的政府有关托洛茨基案件的报告寄给我。我还有幸采访了H.库特教授，托洛茨基逗留挪威期间，他任挪威外交大臣，他特别渴望能详尽无遗地揭示此案的真相。

在调查研究托洛茨基生平中的另一重要章节时，我曾请教过新近去世的约翰·杜威，他对我阐明了墨西哥反审判的缘由，畅谈了托洛茨基留给他的印象，我感谢S.拉特纳博士，他是杜威的朋友兼秘书，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位老教授决定主持这次反审判的背景材料。在许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中，我还应提及约瑟夫·贝格尔先生，他曾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成员，后来被投入斯大林的集中营关押了25年，贝格尔先生对我讲述了他于1937年在莫斯科布提尔基监狱中与托洛茨基的次子谢尔盖·谢多夫相遇的情况。

我还应感谢俄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特别是M.劳索德和M.D.舒尔曼教授，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方便；还有亚当斯馆馆长R.A.布劳尔博士及其夫人，当我在1959年研究托洛茨基档案的保密部分时，曾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我十分感谢霍顿图书馆的威廉·杰克逊教授和C.E.杰克曼小姐，感谢他们极其耐心的帮助；我还应感谢叶莲娜·扎鲁德娜娅-列文女士帮我阅读了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某些文件。

约翰·贝尔先生，丹先生.M.达文先生及唐纳·泰尔曼先生阅读了我的手稿及校样，提出了批评和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夫人不仅作为一位可靠的助手及批评者对本卷作出了她的贡献，从1950年我们开始一起研究托洛茨基档案以来的许多年中，她全身心地进入这出悲剧的气氛之中，她对这出悲剧的人物极

为同情,因而在描绘他们的性格和叙述他们的命运时,她的帮助是不可取代的。

伊·多·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 (1) |
|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 (129) |
|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 (229) |
| 第四章 “人民公敌” | (276) |
| 第五章 地狱之夜 | (385) |
| 跋：失败中的胜利 | (550) |
| 参考书目 | (564) |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将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的局面预先决定了他的未来岁月。人们用不可思议、粗暴无礼的方式将他驱逐出国。当托洛茨基用无数抗议信轰炸政治局、宣称驱逐他的决议是非法的之时，斯大林将驱逐之事延缓了一个星期。似乎是斯大林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或者仍在与政治局商议。最后，猫和老鼠的游戏突然结束：1929年2月10日深夜，托洛茨基及其夫人、长子被押送到敖德萨码头，被带上了“伊里奇号”客轮，之后，客轮立即启航。负责押送托洛茨基的人员和港口当局接到了最严厉的命令，尽管时间已晚、海上风暴猖狂、海面封冻，该命令也必须立即执行。现在，斯大林容不得半点儿拖延。“伊里奇号”客轮和业已启动的破冰船是专门派来执行这

一任务的。在这艘客轮之上，只有托洛茨基、他的家属以及两位格别乌的官员，此外没有其他乘客，也没有货物。这样，斯大林最终使政治局面对即成事实，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一切动摇，也避免了他第一次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托洛茨基时发生的场面重演。那时，布哈林提出抗议，朝他挥动双拳，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并和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投票反对驱逐托洛茨基。^①

驱逐一事在极度保密中进行。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后，驱逐的决议才予以公布。斯大林惧怕发生骚动。军队调到码头是为了防止示威和大规模的群众性告别场面，一年前，当托洛茨基被流放而离开莫斯科时，反对派曾组织过这种活动。^② 这次一个见证人也不能有，也不能有任何一个目击者的证词。不能让托洛茨基和大群乘客一起出海，因为那样，他会在乘客的睽睽众目之下进行消极反抗；甚至命令船上的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禁止他们与他接触。整个旅途都处在令人不安的保密之中。斯大林不愿承担此举的全部责任，他还想等待、观望：外国共产党是否会对此事感到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今后事态的发展是否会迫使他把手请回来。他一心想把这次驱逐安排得模棱两可，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作出体面的解释或彻底否认。在此事发生了几天之后，国外一家共产党报刊作出推测，托洛茨基前往土耳其是为了执行官方或半官方的使命，他自愿来到这里，并带着大批随从。

就这样，托洛茨基突然来到阴暗、空荡荡的客轮上，这艘船将在惊涛骇浪中驶向浩渺无际的天边。甚至在阿拉木图度过了一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周围的空旷仍使他惶恐不安，而格别乌的两名军

① 参见《被触除武装的先知》第六章。李可夫当时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继列宁之后担当苏联总理之职。

② 同上，第五章。

官使它变得更具威胁。它意味着什么？其中隐藏着什么？他身边只有娜达莎和廖瓦，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为了躲避狂风和空旷，他们下到了船舱之中，在整个旅途中一直没再离开那里。空旷似乎在追逐着他们。它意味着什么？旅途将如何结束？

托洛茨基作了最坏的准备。他认为，斯大林不会满足于仅仅把他赶到黑海对岸就这么放过他。他怀疑，斯大林与土耳其独裁者基马尔-帕沙合谋反对他，或是基马尔的警察会在轮船上逮捕他、拘留他，或是会秘密地把他交给聚集在君士坦丁堡的白俄侨民，让他听凭他们的报复。格别乌背信弃义的做法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捕风捉影：他曾多次请求格别乌释放他的两个秘书兼警卫——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并允许他们随他一起乘船出国。格别乌不止一次地允诺，但没有兑现。看来，格别乌决定让他独自上路，不让任何一个朋友陪伴他、充当他的警卫。H. 谢多娃写道，最后，在一个车站上，格别乌的全权代表布兰诺夫“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专线传来的答复：格别乌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冷笑着对他说：‘反正你们在骗我……斯大林在骗我。’”^①

在慌乱和绝望中，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回忆起他们的最后一次海上旅行，那时他们刚刚从一个位于加拿大的英国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乘一艘挪威客轮返回俄国。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家也是这么多人（尽管他的次子谢尔盖当年和他在一起，而现在却不在‘伊里奇号’上），但我们都比现在年轻12岁。”比年龄差别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反差，可他却对此未置一词。1917年，革命召唤他返回俄国进行伟大的斗争；现在，他被一个以革命

^①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致格别乌全权代表——公民福金书》1929年2月7-1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8页。

的名义统治的政府驱逐出俄国。1917年，在英国集中营度过的那一个月，他天天都要在铁丝网包围的集中营内对大批德国水兵演讲，告诉他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监狱及在战壕中所进行的反对德国皇帝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激起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当他被释放时，水兵们把他扛在肩上抬到集中营大门口，高唱《国际歌》欢送他。^①现在，周围是一片空旷和呼啸的风暴。“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已过了10年，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结局莫非注定要像李卜克内西一样。一件无意义的小事描绘出这一反差的荒诞。当“伊里奇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一位格别乌军官交给他1500美元，这是苏联政府送给前国防人民委员的礼物，以便“他能在国外生活”。托洛茨基似乎看到了斯大林嘲弄的冷笑，但他一文不名，只能忍辱把钱收下。这是国家最后一次付给这位共和国之父、它的缔造者的工资。

如果托洛茨基沉湎在对这些悲惨事件的思索之中的话，他就不能其为托洛茨基了。无论环境将会如何，他都毅然面对未来，坚定不移，搏击不已。他不允许自己在虚空中消失。在虚空之后就是尚不知晓的斗争和希望的地平线。过去进入到现在之中，未来中含有过去和现在。黑格尔说过：历史人物一旦完成其“历史使命”，他们将精疲力尽，像空壳般地倒下。^②托洛茨基与这类历史人物毫无共同之处。斯大林及事件把他囚禁在真空之中，他将为挣脱这一真空而搏斗。但目前，托洛茨基只能写下他反对驱逐的最后一封抗议信。在旅途结束之前，他把他写给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的信件交给押送人员。他在这封信中谴责斯大林与基马尔-帕沙以及基马尔的“法西斯国家”警察的“阴谋”，

① 《武装的先知》第八章。

②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第78页。

并警告迫害者，他们迟早要为他们的“叛卖和无耻勾当”负责。当“伊里奇号”抛锚后土耳其海关人员登上船舷时，他将一封致基马尔的正式抗议信交给他们。仇恨与嘲讽从该文件克制的公函语调中流露出来：“我有幸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敬请总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①

托洛茨基根本没有指望基马尔会对这一抗议有所反应，他明白，莫斯科那些迫害他的人始终担心有朝一日不得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便那时表明为公正而求助于历史是徒劳的，他也仍将这样做。托洛茨基坚信，他不仅在代表他本人，而且还代表那些被关押或遭流放而被迫沉默的朋友和战友大声疾呼，坚信那个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暴政会使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及革命本身也遭到损害。托洛茨基深知，不论他个人命运如何，他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并在整个20世纪中引起反响。如果斯大林力图压制所有可能的抗议或见证人的话，那么被驱逐的托洛茨基就会挺身而出抗议，并声明他就是见证人。

※ ※ ※ ※ ※

下船后，几乎发生了一场闹剧。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径直从码头送到苏联驻君士坦丁堡领事馆中。尽管托洛茨基背着政治犯和反革命的罪名，人们仍怀着对十月革命领袖与红军缔造者的敬意迎接他。领事馆腾出一侧的房屋供托洛茨基居住。领事馆的官员中有不少人在内战时期曾在他麾下作战，他们显然力图使他有宾至如归之感。格别乌工作人员表现得似乎他们把保卫他的生命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7页。